

纪
实
与
回
忆

丛书

JISHI YU HUIYI

JiShi Yu HuiYi

萧红与萧军



秋
石
著

学
林
出
版
社



纪
实
与
回
忆

丛书

萧红与萧军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红与萧军/秋石著.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12
(“纪实与回忆”丛书)

ISBN 7-80616-782-X

I. 萧… II. 秋… III. ①萧红(1911~1942)-生平事迹②萧军(1907~1988)-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2930 号

萧红与萧军



作 者——秋 石

责任编辑——朱志勇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75

字 数——33.5 万

版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3001-6000 册

书 号——ISBN 7-80616-782-X/I·291

定 价——24.00 元

面对自内地抵港即来探视的胡风，萧红欣喜异常地说道：

——我们一起来办一个大杂志吧！把我们的老朋友都找来写稿子，把萧军也找来。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

弥留之际，萧红对始终陪伴在她身边的骆宾基这样企盼地说道：

——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一个给予她的民族、国家及人类带过一些光和热的作家。

——现在，疼我爱我的两个人（鲁迅、萧红）都离我而去了……

萧军 1942年5月1日在延安
文艺界举行的萧红追悼会上的发言

——对于这样一位作家，仅仅从事文学生涯只有十年间的历史，为我国文学事业——无论质与量、社会意义、艺术造诣——留下了不可抹煞、不可磨灭的业绩，我们是应该进行一次严肃的认真的研究和探讨的工作……因此我建议你们对她的作品本身多作具体的突入，全面的分析，全面的综合……而获得一个相应的结论，来启示读者，教育读者……

萧军 1978年 北京

——我去看了一次萧红，无论她的生活情况还是精神状态，都给了我一种了无生气的苍白形象。只在谈到将来到桂林或别的什么地方租个大房子，把萧军接出来住在一起，共同办一个大刊物时，她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生气，我不得不在心里叹息，某种陈腐势力的代表者把写出过“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的这个作者毁坏到了这个地步，使她精神气质的“健全”——“明丽和新鲜”都暗淡了和发霉了。

胡 风 1982年 《奔赴香港》

两个倔强的灵魂

——为秋石新作《萧红与萧军》写序

要振青

本月初,在上海美琪戏院开幕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上,北京艺术家为申城观众上演了这次会演唯一根据现代小说改编的话剧,这就是三十年代在上海出版的左翼女作家萧红的《生死场》。据媒体介绍,它轰动了申江,成为这次会演中的“压轴戏”和“开锣戏”。媒体报道说,演出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后,许多观众不愿退出剧场,他们在思考、在回味。

我看了这些报道,衰老的神经被深深地震动了。

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两部描写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下的苦难和愤起斗争的小说,是在他们夫妇三十年代中期辗转流亡到上海后,在鲁迅先生的支持和关怀下出版的。因为当时正是当政的国民党掌权,配合对苏区的武装革命力量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对以上海为大本营的左翼文艺运动,进行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时期,他们这两部小说连同从江西

苏区来沪、从事地下活动的叶紫的描写苏区生活和斗争的短篇小说集《丰收》，商业出版社虽经鲁迅先生一再推荐，仍被退稿。最后在鲁迅先生大力支持下，作为“奴隶丛书”的三种，用容光书局的名义，先后自掏腰包出版。因为是非法出版物，一般书商都不敢经销，都是通过各种曲折的渠道，才送到读者的手中。

萧红的《生死场》是这套“奴隶丛书”的第三种，1935年12月出版。小说的内容是以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村庄为背景，反映了“九·一八”前后，东北人民的苦难与抗争。人们世代在贫困和愚昧中劳动和生活，在这个自我封闭的生活环境里，人们显得愚昧、麻木、自私，以至蛮横、猜忌、多疑，时而自视甚高，目空一切，时而又显得自卑、畏首畏尾，过着蝇营狗苟的暗淡日子。侵略者来了，捕杀、抢劫、强奸，许多人家破人亡，他们终于在沉睡中觉醒了。他们自动拉起了队伍，去投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救国军”，要向侵略者讨还血债。连平日最自私狭隘的人，也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那些最善良驯服的人，也喊出了“不当亡国奴，生为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一部《生死场》正是一部农民的血泪书，它给予人们的不是眼泪与颓丧，正如鲁迅为该书所写的“序文”中所写：“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又如左翼文艺批评家胡风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后记”中所写的：“这些蚊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蚊子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式地为生而死了。”

她和萧军的同一题材，并先她出版的《八月的乡村》，成为这对苦难的夫妇走上文坛的成名作，被一版再版。又由于鲁迅先生的努力，同时又被译介到国外，驰誉世界。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它们很快为圈内外同仁们所接受。毛泽东在抗战中的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对文艺作品所提出的政治准则,由于他们从生活实践出发,不自觉地提前响应了这一号召。这两部作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性。

又据上海的传媒报道,这次北京艺术家带来上海的《生死场》话剧,对原作作了“全新的演绎”。年轻一代的编导从新的历史高度,以开放性的文化心态、立足于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角度,剧作中除强调在日寇铁蹄蹂躏下,村民不论智愚贤不肖,纷纷走上了革命的抗日军事队伍,从事对敌斗争,从死中求生这个爱国主义的主旋律的同时,也通过剧中角色的性格塑造和情节变幻,充分反映了农民在封闭性的传统生活意识下所形成的愚昧、自私、残酷、损人利己和小农经济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野蛮愚昧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就是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根深蒂固。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但由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真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封建主义的阴魂,仍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徘徊、借尸还魂,以换汤不换药的形式为祸中国,“文革”就是一个样板。正如媒体报道所说:“话剧《生死场》是在寻找历史教训,反思某些根深蒂固的落后意识,以这个上演的故事,表现出二十世纪末的人文关怀,并突现出作者的焦虑心态。”(见1999年11月3日《新民晚报》记者沈月明文)因为“文革”及其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他们都是以革命起家,革过别人命的人们。

无独有偶,正是在上海国际艺术节因上演萧红的《生死场》而轰动一时的同时,学林出版社即将推出秋石先生潜心研究二

十年,历经数十次实地调查考证,费时两年三易其稿的长篇传记作品《萧红与萧军》。这本新作也同全新演绎的话剧《生死场》一样,将给予广大中外读者一部充满新意而又真实生动地关于两萧的生活传记。

因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在秋石写作这本书以前,已经有了海内外各类人士撰写了三十多种关于萧军和萧红的研究和传记,这些出版物从各个方面和角度,不同地或为萧红立传作评,或为萧军立传作评,真是百家争鸣,众说纷纭,各抒己见,热闹非凡。

比如两萧在危难中结合,最终又在战乱中悲剧性地分手,这个事实究竟原因何在?在这之前三十余个版本中有一些是借助了女主人公萧红的话来加以佐证的。萧红生前所说的这句话是:“我恨这个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武断地下了这等不分青红皂白无视事实的结论:“当初两萧结合时,爱情天平就不对,是偏向萧军一边的……”

这种说法,其实是很难受到事实的检验的。

如若按照这个结论,似乎当初萧军根本不应该救萧红出火海,或者换言之,萧军这番义举是大错特错了;似乎当初萧军救萧红并非是出自侠义,而是另有图谋的……

作为后人,在评价先人尤其是在评判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和建树的人物时,首要的一条是一定要尊重史实,尊重事物的本来面貌。

那么,当年的萧红是一种什么情况,她所处的环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呢?

确凿无疑的史实包括萧红自己描述的有关当时的情况是:

一个怀了别人的孩子且是将要分娩的大肚子的女人;

一个年仅二十一岁但是已经出现了丝丝白发的青年女子;

4 萧红与萧军

一个因欠了旅馆六百元债务即将被卖入青楼为娼的天涯沦落女。

此时此刻的萧红，从未在任何报章上发表过片言只字，如果说她有满腹经纶和旷世奇才的话，那也只能说是潜在的……

而萧军此举又图的是什么呢？

诚如萧军后来二度重返“跋涉”地故乡时所阐明的那样：两人的结合是一个偶然的结合——在当时，如欲救出萧红，除了接来同居结为夫妻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她一无去处二无职业三又怀了孕，无法独立生活……

有关萧军为什么要救萧红，两萧的结合和两萧南下流亡时最具权威也最具有现实说服力的见证人舒群客观、公正的结论是：一是谁也没有六百元可以救萧红出困境，即使救出来也难以养活一个孕妇；二是谁都清楚，一个腆着大肚子而且是怀着别人的孩子的孕妇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也只有萧军这样侠义心肠的热血青年才会将同情心化为爱心，从而导致令他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产生。

除了萧军救萧红出苦海这个根本前提，我们还应当尊重以下事实：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

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正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以萧红鼓励和几近手把手的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槛……

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继之还是萧军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

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后来被鲁迅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溢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是在萧军壮烈激昂的提示下完成的。

那么,几十年来,又何以会产生“爱情天平的重心不对”的结论呢?

有关两萧离异的真正原因,整整一个甲子以来,我们一直被某种单一方面的叙述左右着。生前,萧红以其“被受暴虐”的“屈辱”面目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在其客逝香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人们也一直反复引用萧红生前的“诉说”加以佐证着,然而,人们似乎从来没有听过萧军有关这方面的辩解或说法,而有些人则是根本不予置理。

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

其一:

1941年夏,胡风先生自桂林抵达香港不日,迅即前往探望患病中的萧红。萧红一见胡风,也当即欣喜异常地说道:

“我们一起来办一个大杂志吧!把我们的老朋友都找来写稿子,把萧军也找来,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

距萧红说这番话相隔整整四十年后,胡风先生在其抗战回忆录《奔赴香港》一节中这样写道:

“我去看了一次萧红,无论她的生活情况还是精神状态,都给了我一种了无生气的苍白形象。只在谈到将来到桂林或别的什么地方租个大房子,把萧军接出来住在一起,共同办一个大刊物时,她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生气,我不得不在心里叹息,某种陈腐势力的代表者把写出过‘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的这个作者毁坏到了这个

地步,使她的精神气质的‘健全’——‘明丽和新鲜’都暗淡了和发霉了。”

其二:

萧红病危弥留之际,在自知无法苟延时,她曾这样企盼地对陪伴在她身边与萧军一样有着满腔侠义心肠的骆宾基倾吐了如下的心声:

“……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有关两萧分手的真正原因,尤其是萧红向他人述说的俩人在上海共同生活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几十年来,萧军一直是缄口默语的,即使是进入晚年以来,他也依然如此。

“决不欺负死人!”

“不搞死无对证!”

上述这些话,充分表明了萧军在这个问题上极为鲜明而又甚为豁达的立场。

1978年9月28日,即将复出的萧军这样回顾道:

“在我的主导思想是喜爱‘恃强’;她的主导思想是过度‘自尊’。

“因此,在我是不能具有托尔斯泰那样的‘基督教’式的谦卑,说‘一切都是我不好’;我也不能责备或诬枉已死者,说‘一切都是她不好’,这是有背于一个作为人的动物的起码品质和道德的。

“因此,对于这一问题,不管是对于故人、老友还是善良的读者们,我只能采取外交官的通行例语:‘无可奉告。’”

做学问,搞研究,其重点是什么?所要达到的目的又是什么?

近些年来,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史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股股浊流;炒古人,炒死人;歪曲、篡改史实;恣意杜撰、制造莫须有的隐史,以至艳史,以达其所谓“轰动效应”。凡此种种,连鲁迅研究也不能幸免。这其中,当数两萧研究尤为突出。一些人既不去研究两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对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伟大事业的特殊建树,以及两萧同鲁迅的关系,同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的关系,又不肯下气力研究两萧的作品,而是在人为制造的误区中纷述杂论,朝有贡献的一代革命作家身上大泼污水,更有极个别者则是乘机浑水摸鱼,用女作家的私生活招徕读者,以饱私囊……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萧军先生生前在谈及萧红研究时深明大义所说的一番话:

“最近在东北,似乎兴起了一阵萧红的研究热潮,其中也有我的老朋友。他们向我这里来征集材料,听取意见,……我给他们的建议是这样:

“对于这样一位作家,仅仅从事文学生涯只有十年间的历史,为我国文学事业——无论是质与量,社会意义,艺术造诣——留下了不能抹杀,不可磨灭的业绩,我们是应该进行一次严肃的认真的研究和探讨的工作,我是赞成的。但是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是应该从他或她的具体作品效果和意义而衡量、而产生的,而不是别的什么‘属性’。因此我建议你们对她的作品本身多作具体的突入,全面的分析,全面的综合……而获得一个相应的结论,来启示读者、教育读者,……。对于她生活方面的一些琐事,不必过多注意,过多探求……否则将会遇到一些难于通过的‘死角’,这是无益而浪费精力的事……”

《萧红与萧军》不是秋石的处女作,也不是他的首部研萧之作。早在1997年4月,秋石就自费出版了他的首部研萧文集

——融史料、研究、辩诬、怀念、回忆与一体的《聚讼纷纭说萧军》(学林出版社)。现在,继《聚讼纷纭说萧军》之后,秋石又推出了长达30多万字的长篇传记《萧红与萧军》。据了解,为了写好这本书,秋石先后自费去了南京、杭州、北京、哈尔滨、锦州、呼兰等地寻访曾与两萧有过来往的好友及知情人等,叙谈并考证了有关细节,阅读比较了500万字以上的有关著作、左翼文学史料等。有时为了弄清一个典故、一个事例,秋石不仅查阅了两萧生前所写的文章及其好友的回忆、怀念文章,而且还不厌其烦地一一核对了鲁迅书信日记及其文章的出处,乃至上百次通过电话同远在北京、长春、海口、乌鲁木齐等地的知情人进行核实,三次前往杭州、南京,专程登门拜访了两位熟知两萧情况的九旬老人——黄源、高原。

与这之前他人所作的有关萧军、萧红的数十个“传记”版本相比较,秋石的《萧红与萧军》一书格外地强调了两萧之间的真挚情感,以及由鲁迅一手扶植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对我国革命文学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重要建树。弥足珍贵的是,秋石在该书中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鲁迅对来自沦陷地青年作家的无限关爱和扶持,在同类研究中首次全方位地对鲁迅回复两萧的全部53封书信逐一进行解析,穿插鲁迅同两萧交往的一个又一个的真实故事,重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感人情景。

针对一些版本中大肆渲染的所谓两萧离异、所谓萧红同许多男人“同居”的细节,以及萧军救萧红别有用心的所指,秋石则依据确凿无疑的史料一一加以批驳和纠正。

值得指出的是,秋石的《萧红与萧军》一书写得比较真实可信。其一,秋石与萧军生前曾有过长达九年的交往。其二,秋石手中拥有与现仍健在(包括已故世)的十多位三十年代见证人交

往、叙谈所掌握的材料。其三,近十年来,秋石一边潜心研究,一边不断“站出来澄清一些事实”,同那些无视史实、恣意杜撰、臆造炮制出来的谬误百出的“传记”予以猛烈抨击,还其历史本来面目。1994年1月10日,台湾“《中央日报》”上刊登了一个名叫李家的人所写的长达15000字的《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文中不乏对鲁迅、对鲁迅的学生、对左翼文学阵营的污蔑、攻击。当这则别有用心之长文被改头换面地转载于内地一些报刊时,秋石则依据自己手中所掌握的确凿无疑的材料,在南北诸多文坛前辈的支持下,于同年9月24日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关于萧军和萧红的一些史料》长文,进行了公开的辩诬。半年后,秋石再次在《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白云原自一身轻——缅怀萧军先生》的长文,该文以确凿可信的史料描述了萧军当年在延安时同毛泽东的重要交往,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可贵贡献,以及萧军在彭真、王实味、胡风、丁玲等人身处逆境时不顾个人安危而仗义执言的种种感人行为。

我与秋石先生素昧平生,虽然这些年在报刊上零碎地读过他记述和论证两萧的文章,如《毛泽东与萧军》(刊1997年5月22日《文汇报》)、《彭真与萧军》(刊1997年9月11日《文艺报》)、《鲁迅与萧军》(刊1997年11月3日《文汇报》)、《萧军与王实味事件》(刊1998年4月1日《解放日报》)等文章。最近由文化界老友谢蔚明、肖关鸿引荐,我们才有缘结识。据说他这次来沪前曾进京会见梅志大姐(她也是两萧的熟人),提起为他的新作写序事,梅志大姐认为我是个合适的人选,因为我们都是同时代人,都是三十年代在鲁迅先生开创的左翼战斗文学旗帜下,走上生活和文学道路的,我们有共同的“祖师爷”。鲁迅先生1936年10月在沪逝世后(当时萧红正居留东京),由留日同学自发举行,并由左联东京支部主持召开的鲁迅先生追悼会上,一致

公推萧红当追悼会的主席。当时我正在日本亡命兼留学,她和我有一面之缘。鲁迅先生逝世后,继承和发扬了鲁迅先生战斗传统的胡风先生主编的战前出版的《学习与工作丛刊》和抗战开始后出版的《七月》杂志,撰稿人员都是鲁迅先生晚年周围的那群青年朋友,包括萧军和萧红。我则是一个初来者,因1937年春,我在日本向《学习与工作丛刊》投稿,结识了胡风并在抗战开始弃学回国后,在战乱中,与胡风结成生死患难的情谊。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夫妇应当时哈尔滨的北方文艺出版社的邀请,到这个号称“小莫斯科”的城市,做客访问。我们在哈尔滨居留期间,曾专程去呼兰县,访问了萧红的故居,表示了对她的悼念。萧军则是五十年代初我们夫妇进京省亲时,在胡风的北京寓所相识,一见如故。1979年秋天,我头上还戴着戴了二十多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政治帽子,进京开会。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我还专程去访问了萧军,事后并写了《萧军印象》一文。最后相晤,则是在1986年八宝山胡风追悼会上。这半个多世纪来,萧军和萧红的坎坷命运,比如萧红客死香江时,陪伴在侧的是骆宾基,也是我的一个熟人。至于萧军,他建国前后的坎坷的政治命运,则是我们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同路人”。我们先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蒙难受冤,蹲过监狱,一再受到批判,都是八十年代历史转轨、社会转型以后的“出土文物”。从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来说,为秋石先生的新作写序,应该是我这个后死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同时,对秋石先生的辛劳和勤奋,致以深深的谢意。他正值盛年,希望以后在两萧研究,包括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研究中,不断走向深入,拿出更多富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和文化品位的新作。

最后,引用我在《萧军印象》一文中的最后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